

# 从地域文化空间转换看清初易堂九子古文创作

吴昌林, 唐季冲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将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地域文化的大空间里,文学则不再被静态地描述,更能显示文学具有社会性。当地域空间发生转换,地域文化也相应变化,易堂九子交游面广,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地域文学之间的互动。九子参与地域性的文学活动,与不同地域文人之间交往,他们在交往中加深了解,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章分别选取与九子交游甚密的、具有代表性的江右文人、吴越文人、皖粤文人,探讨九子与这些文人之间的往来唱和、相互切磋,从而揭示九子创作风格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 易堂九子; 古文创作; 地域文化; 空间转换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1-0084-08

以魏禧为领袖,易堂九子由魏禧、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魏祥、彭任、曾灿、魏礼九人组成。作为明末清初遗民,九子隐居在翠微峰,砥砺气节,其自强不息、坚贞志节令人称赞。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如蘖,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籍他们人格之潜力,来提倡革命最有效之工具。”<sup>[1]</sup>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对易堂九子评价也很高:“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香,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冰叔、和公号宁都三魏,与同县邱邦士、南昌彭躬庵等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sup>[2]</sup>

易堂九子游历于不同的地域之间,结交许多文人志士,与之谈文论道,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九子古文创作。当创作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的时候,九子古文题材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 一、九子生平的交游与游幕

易堂九子中,魏氏三兄弟和彭士望、邱维屏、曾

灿以游历为重要事业,纷纷走出宁都,游遍天下,而李腾蛟、彭任、林时益则隐居不出。魏际瑞以游幕为依托,足迹几乎遍布天下。康熙元年(1662),魏禧时年三十九岁,他意识到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外出开阔自己的见识,在《上郭天门老师书》中写道:“壬、癸之际,私念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于是毁形急装,南涉江淮,东逾吴浙,庶几交天下奇士。行旅无资,北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反山中。”<sup>[3]</sup>最终于康熙十九年(1680)卒于客途中。魏礼曾自称“性好游”,顺治十六年(1659)出游,甚至举债游涉万里,南极琼海,北抵燕西,出游一二年或者三四年返回宁都易堂。彭士望出游时间不固定,主要游历于东南一带。曾灿在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出游,游历活动主要在吴越之间,晚年潦倒而游于清幕,最终卒于游途之中。<sup>[4]</sup>

九子游历承载着他们的理想与寄托。首先,他们把游历作为广交天下之友的途径,发现人才,改变明末以来的颓风,来实现经世致用的主张。其次,九子出游的目的是为了扩展自己视野,增长见识。宁都位于江西赣南,相对于吴越文人之地,显得偏僻。而且,赣地百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养成了不喜欢游历的习惯。所以九子想借助游历感

**[收稿日期]** 2018-10-1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专项基金(CSQ11040);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GL1307);2018年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18QM061)。

**[作者简介]** 吴昌林(1964—),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唐季冲(1989—),男,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生。

受外面的大千世界,以此砥砺自我。魏礼在《孔英尚文集序》中说:“是故吾江西地瘠而民朴,鲜淫巧之技、荡心之货,质胜乎文,礼义廉耻,有短垣不敢自逾。然而广己造大,必资于大国名区、人文辐辏之处。情伪万有,览风土时物之正变,拓一己固隘之拘虚。然而浮足以荡吾朴者有之,文足以漓吾质者有之。蹶弛之士,或先末而后本;气矜之夫,或尚成而遗义;风波之民,见事风生,凿空而架构,皆不可不察也。是故善游者,集众思,广众益,收效于无穷;不善游者,破其故美,荡析无遗,集众弊于一身。噫!行则为世之敝人,文则为世之敝文而已,恶足尚哉?”<sup>[5]</sup>游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生存常态,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魏禧在《曾庭闻文集序》中指出交友对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气质。”<sup>[6]</sup>九子出游结交天下志士,通过游历来补充自己对自然环境的不足,相互切磋砥砺,亦师亦友,从而陶冶自己的气质。九子所交游之人,对其影响有大有小,本文从中选出若干代表,逐一论述。

## 二、江右文人与九子谈学论文

明末清初,江右之学,以髻山节义、程山理学和易堂经济文章为著。“程山七子”有谢文潄、甘京、封浚、黄熙、威龙光、曾日都、汤其仁,以谢文潄为代表。谢文潄起先和清初部分学者一样,专心讲阳明心学,直到四十岁时在新城传播心学遇到鼓吹程朱理学的王圣端,谢文潄和王圣端辩论后,谢文潄折服,转而崇尚程朱理学。谢文潄主张学畏天命,躬行实践为主,宗程颐、张载“主敬”说,以复兴理学为己任,著有《初学先言》《程门主敬录》《左传济变录》《易学绪言》《大臣法则》《兵法类案》,以及《学庸切己录》2卷、《谢程山集》18卷。甘京、封浚、黄熙、威龙光、曾日都、汤其仁六人治学严谨,每天三省己身,相互学习。魏禧在《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中评价他们:“美公毅而介,长人和而有守,樵斋、二为坦中而好义,维缉虚己而挚。”<sup>[7]</sup>

“髻山七隐”有宋之盛、吴一圣、查世球、查小苏、余倬、夏伟、周长孺,以宋之盛为代表。宋之盛等七子隐居髻山授徒讲学,江西巡抚蔡士英曾经聘请宋之盛为白鹿洞书院山长,被他拒绝。宋之盛有故国情怀,誓不出仕做清朝官员,精研《春秋》,宗程颢,以识仁为要,尝作《仁论》。张尚瑗曾在《宋惕传》评价《仁论》:“此书首论仁,次性气,辨异、穷经、订古、经世各数百千言。明季江右学者多宗阳明,惕举其最表表者,以为李见罗、罗念庵未能穷理,欧

阳、东廓议论极疵,独以明道、濂溪为宗主,阐发朱子极高明道中庸之旨。”<sup>[8]</sup>宋之盛在《仁论》中论道:“仁之道,先生不己者,天地以是生,而生人类物不己者,天地之所以为心也。人得之以生,而不容己于群焉。俱生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也,只是个仁。默识,识此学不厌;学此,海不倦;海此心安为仁。此心不安为不仁,因不安而求安,谓之求仁。告子之心,病在不安,处不知,求识仁,则体段光风霁月;不识仁,而只事澄治,则为寒潭霜月矣。儒学生生,其法从不忍入;禅学无生,其法从忍入。形色,天性也。道家必欲形与神抱,禅家必欲形与神离。物态万有不齐,无碍太虚,犹是太虚映现之说;物态所以不变者,乃太虚之气蒸变使然也。只心一便是太极,心一便于万物为一。识得与万物一体,则同患之忧与反身之乐,非两时两事。”<sup>[9]</sup><sup>472</sup>

谢文潄主张“以诚为本”,宗程颐“主敬”说,学习程朱理学;宋之盛“以识仁为归”,也宗程颐;而易堂九子则主张以实践为主的经世致用之说。谢文潄以江右理学为正宗,对何心隐、罗汝芳之说持否定态度。他的“主敬论”是为了阐扬程朱理学,唤醒世人对传统儒学的认同与复归,所以潜心注疏《学庸切己录》,以复兴程朱理学为己任。而宋之盛重在“识仁”,其观点与谢文潄有许多相契合之处。宋之盛擅长古文,郭思敬在《髻山文钞》中评价宋之盛:“虽讲宋学,而文笔清挺,无宋末语录之弊,如篇中《郭义士传》《先府君墓志》诸作,虽冰叔、躬庵无以过也。”<sup>[9]</sup><sup>475</sup>魏禧则强调“积理练识”“经世致用”之说,好观古今之治,长于史论、策论。梁启超在《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评价三家:“时江西有谢秋水文潄,辟程山学舍,集同志讲程朱学,病易堂诸人‘言用而遗体’,贻书冰叔争之。冰叔复书道:今之君子,不患无明体者,而最少适用。学道人当练于世务,否则试之以事,则手足错乱;询之以古,则耳目茫昧。忠信谨守之意多,而狭隘杻牵之病作,非所以广圣贤学也。”<sup>[10]</sup>易堂学风,观此可见一斑了。

顺治十年,三家在南丰程山相互交流,对“仁”与“术”哪个为本展开了论辩。魏禧以术为本,认为从“术”上做起,认认真真,而不能只谈理性,否则诈伪丛生。在《目录·里言》中魏禧说:“予向喜仁术两字,初谓是理中当有此番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几许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种诈伪,便把‘仁’字放空,却将‘术’字做了把柄。故日用之事,须十分兢业,常常提著‘履霜坚冰’之意。”<sup>[3]</sup>而谢文潄和宋之盛认为“术”从“仁”中出,以“仁”为主,据《目录·谢约斋评语》记载:“须是‘仁’字十分深重,‘术’字从

中生方妙。倘于‘术’字著喜，则‘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术为主矣。”<sup>[11]</sup>

另外，古文创作在“体”与“用”，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彭士望与谢文洊的观点不一样。彭士望主张实用，批评明末阳明之学流为空疏之弊，在《与宋末有书》中彭士望指出了这一现象流弊并提出策略：“天下五六十年，患虚病极矣。其下者不足言，文章、经义、名誉、气节，皆虚病也。相延而至于理学之议论郭廓，经济之影响云雾。袞袞坐谈行义高举，顾为世之龙肉醴泉，而不能为世之布帛菽粟，于民生之酷烈饥寒，气运之倾危陷溺，则相与从容拱手，恃虚美以救之，谓可以易天下。亦徒见其迂疏愤乱，至困弊而莫之继，而相随以死也。惟核名实，黜浮伪，专事功，省议论，毕力于有用之实学。胆识以充，器量以宏，精神以敛，强力以优。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以沟壑为家，以忠信才敏之友为命。操练精熟，宠辱不惊，庶足以任宇宙之大常大变而无所于挠。”<sup>[12]</sup>

谢文洊则以为不然，在《乙巳与易堂魏冰叔书》中，对彭士望经世致用一说提出了否定：“躬庵文字之卓练，人所共赏，但其后段立说觉有愤激之气，以经义节气，尽归虚美，似亦大过。谓未免有虚美者藏其中，则可；谓经义气节总归虚美，则不可；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之有济于世用，则可；谓经义气节者，反不如其实用，则不可。盖刑名富强、智谋才武，如不本于经义气节，则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也。虽区区有利于目前，其遗害于后世，正自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利于当时，而启迪万世之心，维持万古之纲常，究有厚望焉。……今乃悉以经义气节为虚美误世，以实用归于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抑扬不平，使后进不善读书，不悉力以趋功利不止甚矣，立言不可不慎也。且篇中论学术未能尽情洗发，归诸正大，虽身体力践，验诸实事一段，似有归著。然于精微之奥、广大之规，未见一语透出，其所谓入之者深，敛之者密，未必是大本大原所在，而出之无穷，发之不聚者，岂遂可不谬不悖乎？”<sup>[13]</sup>

魏禧对两人的辩论，从中调停，但偏重于彭士望经世之说。在魏禧看来经世之用是“体”与“用”争论的延续。魏禧在《复谢约斋书》中说：“所教躬庵《送熊生序》‘经义气节，总属虚美’云云，弟今虽未甚记忆，恐躬庵初不如是，或词气抑扬过当而自晦其意也。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有济于世，经义气节反不如其实用’，此则专就经义气节迂疏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于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

未必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万古纲常者，功甚大’。此又专就经义气节之最高与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于其上。愚以为两者之说，皆所谓钩金舆羽，比量重轻，骤而视之，似为大反，细而求之，实无异同。何者？经义气节，迂疏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为是。而刑名才智违教害义者，实躬庵所不与。程山、易堂大抵于体用中各有专致，彼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见以辅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sup>[6]</sup>

对于谢文洊的批评，彭士望在《与谢约斋》中予以回应，对谢文洊静坐修美给以委婉的批评。彭士望说：“望所与时贤语者，惟保恤穷民，护持善类，汲引人才，培养才俊。无论治乱，俱在世道民生，有裨实用。与冰叔《报翟韩城书》《送黄孝廉会试序》互相引发，绝不敢为过高之论。必欲南辕北辙，徒令其腹笑我辈迂阔，远于情事，仅以文辞往复，而竣毫无益于彼此也。窃以为学工夫自非专久静一，屏谢杂务，培植基本以年岁为期。而遽欲以宰制经纶，主持斯道，将不免于牵补架漏，走透渗漉，其稍能自力者或可免显然之悔，尤其不能者，则义袭貌恭，情伪色裹，纷然潜伏而不自觉。”<sup>[14]</sup>魏禧也批评谢文洊静修之说，在《与谢约斋》中表明：“先生之学，以调养心气为主，然心处静处，何由徵之？但能于横逆之来不愤慨，于逆耳之言不嫌忤，于烦杂之境不燥乱，则此中学问得力与否，但自可考。故养心气者，不止在静中得力，而须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夹辅成之也。”魏禧认为要达到修养，应该学习实践，不能闭户读书，这样不能求得真知。<sup>[3]</sup>

那么，古文如何能达到经世致用？易堂九子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通过交游传播自己的主张，也可以兴办教育，招士讲学培养人才；其二就是从历史中寻找经验，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魏禧创作《左传经世》，彭士望论述《资治通鉴》《春秋五传》，可以看出易堂九子对史学经验非常重视，努力寻找种种具体知识经验。魏禧在《左传经世序》中讨论了史与道的关系，认为史学可以解决现世问题：“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是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禧尝以为：《尚书》，史之大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明其理，达其变。……尝观后世贤者，当国家之任，执大事，决大疑，定大变，学术勋业烂然天壤。然寻其端绪，求其要领，则《左传》已先具之。盖世之变也，杀夺、蒸报、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极。身当其变者，莫

不有精苦之志、深沉之略、应猝之才，发而不可御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谨操其事之始终，而成确然之效。”<sup>[15]</sup>

另外，在对待儒禅态度上，谢文洊和宋之盛力辟狂禅之非，欲复兴儒学。而魏禧认为，世无真禅，哪能害儒？禅学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产生不利影响的是士人不务实学，所以世人要从一件件实事做起。宋之盛将禅学视为亡国的毒害，反思明代世人空谈心性，结果亡国。谢文洊也对禅学予以批判，在《谢程山集·禅根论》中云：“不知生死为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真机，何用趋之、脱之、空之为哉！至于身死，则公理、真机之尽耳。阴阳之气有凝聚，必有解散。”<sup>[11]</sup>除此，在士子涉世问题上，三家也有不同观点。谢文洊认为士子涉世带有功利性，士子应该以学业为主，专门用心一意，如果以涉世为主，就会沦为俗人，慢慢偏向功利，失去了士子原本面貌。而魏禧在《目录·谢约斋评语》中认为：“涉世处即是自己做学问处。若能体认，涉世便是学问。”<sup>[3]</sup>宋之盛偏向于谢文洊，在《目录·宋之盛评语》中云：“叔子欲以经世而正人心，先生欲以正人心而经世，二者不可偏废，究之人心，是有本有体，然后用有所根。”<sup>[6]</sup>三家探讨思想学术，虽然主张上有所不同，但面对异族统治，仍能取长补短，促进江西学术发展。

在与九子交往的江右文人中，杨文彩值得一提。杨文彩，字治文，晚号一水，宁都人，是魏禧的老师。魏禧是杨文彩最得意的门人，杨文彩曾经编著《尚书绎》，与魏禧商量定稿，在《杨子书绎·指略》中自叙道：“《书绎》既成……然惧一人见有所蔽也，必有人为补正讹，庶几告无罪先贤，爰以其事属门人魏禧叔子，盖非有同量之人则不能如于其中，非有异量之人，不能出乎其外，由是共处一室，相与扬榷，首正谬，次雍繁，义有未尽，复著为论，以补所不逮。是书之成，其功为多。”<sup>[16]</sup>除了魏禧，李腾蛟、邱维屏、曾灿、彭士望、魏际瑞等都和杨文彩有诗文唱和。

除了杨文彩，还有南丰汤来贺与九子有过交往。汤来贺，字佐平，号惕庵，南丰人，著有《鹿洞迓言》《居恒语录》。魏禧与汤来贺为忘年之交，常书信往来，相互规谏。汤来贺曾经指导魏禧为文之道，在《复魏冰叔》中云：“虚心在酌，宁守先儒之规矩准绳，勿放言高论，以启蔽窦。凡一己所见而众人以为未确者，勿可言也，即一时众皆称许，而以圣贤之道揆之，或恐流弊于后世者，亦勿可言也。”<sup>[17]</sup><sup>[24]</sup>彭士望、曾灿、彭任也与汤来贺有诗书往

来，彭士望曾为汤来贺的《内省斋文集》作序，在《内省斋文集序》表达了自己对汤来贺的钦佩之意：“先生长才干济，而其心自少至老，必不肯一日饱食优游，无所益于世事。其文章亦绝少蹈袭，率胸怀尽所欲言而止，情事爽豁，俱有实际。”<sup>[18]</sup><sup>[25]</sup>

九子在文学上还与其他江右文人有过交往，比如新建杨益介、宜春张自烈、新建徐世溥、临川傅占衡、新城涂酉、新城涂斯皇等，他们都影响了九子古文创作，对提升古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 三、吴越文人与九子往来唱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同的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塑造了作家不同的审美观。魏禧在《曾延闻文集序》中说：“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资。司马迁，龙门人，纵横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方江海云草木之气为多。”<sup>[19]</sup>只有游历才能开拓和变化自己的风格，以此超越自我。九子游历吴越之间，与吴越文人交游，以求开拓更健全的作文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持相似的文学理论，对古文创作具有相近的态度。

吴越文人中，与九子交游甚好的有归庄。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价归庄：“其文胎息深厚，不务纤徐有致，可谓善于学有光者。诗述家难，意酸辞苦；至于登临游览，神气飞腾，奇乃在骨。”<sup>[20]</sup>魏禧与归庄相友善，早在认识之前，魏禧就知道归庄声名。魏禧在《归元公六十序》中记载道：“吾年未三十时，闻归震川先生有曾孙庄，抱高节，负才使气，善骂人。既有传长歌至山中者，凡三千余言，上溯鸿蒙，下及季世，驱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答卿相，践籍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平、李白沈冤醉愤无聊之语。客曰：‘此归元恭庄所作。’予惊怖其人，疑不可近。”<sup>[3]</sup>康熙十二年（1672）仲夏，魏禧游历吴门，归庄慕名而访，其间总共四五次。魏禧在《归元公六十叙》中谈道：“壬子夏，侨吴门，元公闻之，趣过予。予方畏暑未之报，元公则四五至不为嫌。每至，挟其文，余亦出新旧文。二人者相攻谪其不足。予叹若元公者乃可以狂，然元公方摧刚为柔，虽龙性不可得驯，可阅世既久，学日就敛实。”<sup>[21]</sup>可见归庄对魏禧的敬意。二人相见时为文切磋，相互指出对方不足之处而不溢美。后来魏禧将要回往宁都，归庄拿着羊羹、脯鱼和酒为魏禧践行，魏禧在《哭莱阳公昆山归君文》中回忆道：“棹小舟，独送禧于浒墅关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sup>[3]</sup>可见二人友谊之深。

除了归庄,九子与仁和毛先舒在文学上有过切磋交流。毛先舒,字驰黄,仁和人,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谓之“浙中三毛”。魏禧与毛先舒常有书信往来,谈学论文,在《答毛驰黄》中,称赞毛先舒为文以本领为贵:“今天下家殊人异,争名文章,然辨之不过二说,曰本领,曰家数而已。二者又以本领为最贵,驰黄留意经学,治儒先之言,可谓有本;而措之文辞,虽杂出《文选》、六代,然朴气未离,深朗雋整,殊为近古,非小家所及。”<sup>[6]</sup>当然,两人也有争论的时候,但彼此以理相争,不涉及个人攻讦。两人曾经就于谦在景帝易储一事上谁是谁非有过论辩。毛先舒在《于太傅论》上下篇,反对时人批评于谦未尽大臣之责,为于谦辩解:“或谓于太傅谦为景皇帝所倚信,易储时不能力争,为失大臣之道。未尝设身处境,而权事理之重轻者也。”<sup>[22]</sup>魏禧认为于谦作为君子有不谏之失,在《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中云:“夜挑灯读大集,叹西陵才数,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属足下。而足下诸论,识议卓犖,尤不暇指数,独于《于太傅》上下篇,援经据史,辩论澜翻,陆冰修、沈甸华皆深然其说,禧则最以为未可。盖此论关系兄弟君臣大义,言不合道,则贻祸天下万世不小,不独文章工拙之故,清极言之。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没其大功,不谏之先,正不必为太傅讳。”<sup>[3]</sup>当然无论对错,两人各有道理。

与九子交往的吴越文人,主要有朱彝尊、曹溶、陈玉琪与邵长蘅。朱彝尊,字锡鬯,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与魏禧、魏际瑞、曾灿常书信往来,谈学论道。朱彝尊在《看竹图记》中称魏际瑞:“叔子居易堂,读书且二十年,天下无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吴越,海内论文者交推其能。”<sup>[23]</sup>魏禧也为朱彝尊文集作序,在《朱锡鬯文集序》中说:“年十七自弃举子业,学古文,博极群书。既食贫,历幕府,则之豫章、之粤、之东瓯、之燕、之齐、之晋,凡山川、碑志、祀庙、墓阙之文,无弗观览。故所作文,考据古今人物得失为最工,而经传注疏亦多所发明。”<sup>[24]</sup>称赞朱彝尊为人为学,难能可贵。

曹溶,字鉴躬,号秋岳,浙江秀水人。魏禧、曾灿与曹溶往来频繁,魏禧在康熙十年(1671)八月游吴越,为曹溶《金石表》作序,又为他所居倦圃作《倦圃说》:“多古树,又多水焉,高高下下,水出其间,倦翁手植梅今在墙际。……庄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犹鸟之倦而还焉,而将复飞。故曰:‘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力。’是故倦,所以培风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盈涸焉。孟子曰:‘盈科而后进。’科

者,水之所以息其倦也,而不可以止。是故四时以冬为心,至日闭关,商旅不行。……是故鸟倦而后知者也,倦而知,则其明不息。”<sup>[18]247</sup>文中准确地言明了曹氏心态。

陈玉琪,字赓明,号椒峰,江苏武进人。魏氏三兄弟与陈玉琪为好友,他们相识还是在陈氏经营《文统》时,想将魏氏三兄弟文章编入《文统》之中。魏禧在《答友人论文统书》中详明原委:“仆兄弟文,向为邹程村得之,遂与椒峰选《文统》中。然两君皆无一面之识,尺寸之书未通。旧秋仆自浙过毗陵,与椒峰谈相得,会须为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馆舍,至淹旬时,日夜有校讎。仆好朋友,又多酬答,初未尝稍与选事,且是选经始于邹、董、龚、陈,收功于椒峰,十九已为成书。”<sup>[17]165</sup>陈玉琪与魏氏三兄弟相处十分友好,魏禧曾为陈氏的文集作序,在《学文堂文集序》中称赞陈氏之文:“由唐、宋溯秦、汉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调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sup>[7]</sup>陈玉琪也为魏际瑞、魏禧文集作序,并作《送魏伯归宁都》《送魏冰叔归宁都序》言明送别之情。曾灿也与陈玉琪相交甚好,陈玉琪为曾灿《过日集》作序,并且在一起谈文论诗。

邵长蘅,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苏武进人。魏禧在康熙十年(1671)冬游历毗陵,与武进邵长蘅结识,二人谈文论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二人常常书信往来,相互砥砺。邵长蘅在《与魏叔子论文书》中记载道:“某顿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论文数书,学者作文之法綦备,独疑于文章之源,尚蓄而未发,意善《易》者不谭《易》耶?抑有所秘也。”<sup>[18]267</sup>

在文学上与九子有过往来唱和的吴越文人还有无锡顾祖禹、长洲徐枋、丹徒冷士崐、沛县阎尔梅、常熟钱谦益、昆山徐乾学、钱塘汪颯、平湖李天植、嘉兴周箕,他们对九子古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四、皖粤文人与九子相互切磋

九子取得如此成就也得益于他们彼此切磋,经常提出疑难问题,展开讨论,在争论中规谏得失,在欢笑中严明学规。九子希望多交一些志趣相投之士,可为国家担大任,为生民匡大厄,足以济天下事。在皖粤文人中,对九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方以智,他不仅亲自访问翠微峰易堂,还为林时益看病,为李腾蛟的家谱作序,为曾灿已故的父亲写墓志铭,还单独与邱维屏推演易理。据魏禧《邱维屏传》中记载:“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论算,退而语人曰:此神人也。”<sup>[19]251</sup>方以智与彭士望

也有过切磋交往,在方以智的《游梅川、赤面、易堂记》文中有记载。另外,魏禧的《桃花源图跋》也记载了清初方以智与易堂九子交往情况。

方以智,字曼公,号鹿超,桐城人,与冒襄、陈贞慧、侯方域被称为“明末四公子”。方以智最先认识曾灿,顺治三年(1646),曾灿为避祸在天界寺落发为僧,方以智向曾灿引荐觉浪禅师,之后二人时常诗文往来,相互唱和。顺治十六年(1659),方以智应曾灿之邀,造访易堂。此行,翠微峰胜景及九子热情的款待,给方以智留下了深刻印象,方以智在《游梅川、赤面、易堂记》中感慨道:“诸公或土著,自城依岩;或流寓,种植自给。二十年来,各携其家,踞峰顶,读书怀古,敷衽啸歌,扶义古处,有茹肝澡雪之风,山川以人发光,良不虚哉!”<sup>[25]</sup>易堂诸子对方以智尊敬有加,邱维屏在《木立师六十寿卷跋》中回忆起方以智初到翠微峰的情景:“先是十二年,予舅魏冰叔馆水庄。一日招予曰:‘有僧至,殆非常人,盍来见之。’予走见,语数日而去。后李咸斋又自三岫呼予曰:‘师置黑白子,分合图书、易数不能解,尔能解不?’予则又见之。见论阳明子《三间喻》,师遂出《三间说》及各安生理说。见者皆读,读或三四,读或六七,读或八九,读乃能通解。久之,廩山使迎师,师归。”<sup>[19]289</sup>方以智造访易堂之后,九子与其往来频繁,多有诗文唱和。

桐城派与易堂九子有渊源,易堂可谓桐城派的前驱。清中期江西文人以新城为盛,即现在的江西黎川,新城的文人重视理学涵养,以乡贤曾巩为师法对象。在魏禧同时代有以古文知名的涂宜振,至乾隆时期古文尤以鲁九皋和陈用光更为知名。陈用光师从姚鼐,学习古文,姚鼐南归后在江西新城发现了古文群体。他们与魏禧一样皆以“积理练识”为闻,所以姚鼐对江右文章气节十分推崇。另外,曾灿、彭士望与桐城派钱澄之之交好二三十年,魏禧弟子王源曾向方苞学习经义文章。可以看出,易堂与桐城派交往密切、关系友好。清代尚镛在《持雅堂文钞》中评价朱仕琇、姚鼐、魏禧在新城古文演变中起到的作用,指出三人不免有地域意气之争,文末将姚鼐与魏禧进行了比较:“昔宁都魏叔子,以经济有用之文学,显天下百余年,而建昌之新城,为叔子教授之地,遵其道尤挚,乃自闽中朱梅崖出,新城人变而从之,又自上江姚姬传出,新城人又变而从之,于是西江诸文人,闻风附和,皆视叔子为牟髻,而耻言及之。呜呼,此于叔子何所损,吾特恐经济有用之文学不明于世,而人别驱于虚伪之城,举无益于时艰也。盖尝观梅崖之文好宏伟而失之艰

深,且全为应酬而作,已大失古人立言之旨。姬传则务为严谨,而不能扩充其体,变化其法,以追马太史、韩吏部之高踪。……姚之所宗者方望溪,望溪能敛而不能放,放则迂。叔子本领切实,有是失乎?夫以叔子见闻之宏,持节之固,育材之多,能使当时之贤人君子,生死无异词,能使身后之妻子弟侄,死义死孝,遵其教而不易所守,此即文章不工,亦当取其立言之有本,舍其末而不论,而况其文宗仰之正,无体不工,而乃以小儿叫跳诋之乎?……自宋迄今,儒者之言易醇,古文之法易守。故必切万物之情,乃为真儒者,成一家之则,乃为真古文。梅崖好矫揉,姬传好修饰,律以唐荆川所谓精光注、本色高者,且概乎有愧,况求以易堂经济之学乎?而顾当舍叔子而从之乎?顷读吾邑《彭躬庵文集》,如涌万斗之源泉以灌四方之涸泽,才情气魄似更在叔子以上,而人亦多相谤,以为异于儒者之文,然则文必拘迂无用乃为儒者乎?呜呼,此宋后之人文,所以多不如古也。”<sup>[26]</sup>从文中可以知道,易堂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桐城派发展的历程中,易堂起到一定作用。

九子交往的皖中文人还有孙默与施闰章。孙默,字无言,号黄岳山人,休宁人。魏禧、魏际瑞、魏礼、曾灿等与孙默关系友善。魏禧曾作《与休宁孙无言书》,文中与孙默论文章与交游之道,申张他的经世主张。康熙二年(1663),孙默将要到黄山隐居,魏际瑞为之作序,在《赠孙无言归黄山序》中云:“予以壬寅夏入燕,其明年,予弟凝叔寄其所为诗文,就质于予,则有《送孙无言归黄山》者,谓无言住广陵十载,无一日不言归,朋友之为诗文以送者,盈一簏。无言方新其居,而言归如故也。又明年,予弟和公取道广陵省予燕邸,出其赠答诸作,又有所谓《选孙无言归黄山》者。……和公云:‘江南乙亥之乱,无言弃其居室,独身逃去,惟保所赠归之诗文于怀,叫呼而示人曰:吾此幸无恙也。’於戏!无言至于朋友与文章者如此,予虽未交无言,即无言之人可知矣。”<sup>[27]</sup>由此可见,两人相交甚好。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与宋琬有“南施北宋”之称。魏禧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施闰章虽未与之谋面,却早有耳闻。施闰章在《寄魏凝叔》中写道:“仆闻之君子尚友,古人读其书不见其人,可近也,然读其书尝恨不见其人。古人往矣,且恨不得见,况当吾世,近在二千里之外者乎!仆读先生之文有年矣……顷年先生屡客吴越维扬间,卖文为活,仆又卧病山中,无因缘相见。向从程穆倩递中得所惠文集,知有意。向仆窃闻当世之论文者,多举汪户部钝庵、魏叔子凝叔为二家,于户部

既习游而上下其议论矣,念不可独失魏叔子。”<sup>[28]459</sup>魏禧为施闰章作《愚山堂诗文合叙》,称其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所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义味深长,详复而不厌,文章魁伟之士,退然不敢践其藩篱。”<sup>[3]</sup>之后,魏禧卒于仪真,施闰章专门作《寄祭魏叔子文》以怀念:“力疾作诔,偕诸同人南望呜咽。”<sup>[28]479</sup>施闰章也为曾灿的《过日集》作序,在《过日集序》中云:“青藜曾氏,西江之能言者也。其学与宁都易堂诸君子相砥砺,与人不苟同。挟其艺游京师,四方所交弥众,而论诗特择以真气为正始,不袭浮格;卒之厚本古学,波澜阔,包纳细流……庶几免焉。”<sup>[28]483</sup>在文学上与九子有过交往的皖中文人,还有桐城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文、钱澄之。

易堂九子结交友人的宗旨是,在治学上能相互砥砺、集思广益。他们游览山川都邑、了解民间疾苦,对增强写作现实性起了很大作用。九子还结交了陈恭尹、广东北田五子等粤中文人。陈恭尹,字元孝,号半峰,晚号独漉山人,与同邑陶廛、梁钲、何衡、何绛隐迹于北田,世人称之为“北田五子”。顺治末年,魏礼游于岭南,与陈恭尹等北田五子结交为好友。陈恭尹在《朱厓歌送魏和公》中记载道:“魏和公自宁都过余,再信宿,为深知,余不自知然也。”<sup>[29]</sup>康熙十四年(1675),彭士望赴岭南游历,与陈恭尹、何衡、何绛等北田五子相会,在《独漉堂诗序》中回忆道:“吾易堂魏和公从南海归,亟称陈元孝之人与其友,推重其诗,予同堂咸信之。虽未一识元孝,间寓书辄齿兄弟。乙卯,挟衰冒艰险数千里入粤,始得见元孝,与之语,落落穆穆,不能口给,久而意味出焉。”<sup>[14]</sup>曾灿也曾数次游于岭南,与北田五子交游甚好。

九子与北田五子交游往来,常谈学论文,相互切磋。陈恭尹将自己的诗文赠与九子,彭士望在《独漉堂诗序》中表示对其诗文的推崇:“元孝有大气鼓橐,其中郁不得逞,远览放游,束缚归里,非其所好,磨礲圭角,低头就之,随物肖形,以其类应,浑浑莫窥其际间,有刑天舞戚、衔木填海之思,跃冶迸出,随意遮扫,灭去爪迹。始以我法用古人,久之,并不见法,惟有真意盘旋楮上。予故谓元孝,今之杜甫也。”<sup>[19]259</sup>魏际瑞也寄文集给陈恭尹,述其遗民之志。魏禧于何母七十之寿时作文祝寿表示,自己虽未到过岭南,但与北田五子神交已久,在《岭南适笔叙》中云:“吾乡与岭南接壤,予常以谓不足游,故吾伯、季皆客之,予独未往……近与顺德陈元孝诸子为神交,则欲往而未暇。”<sup>[30]</sup>九子在文学上与其他粤中文人有过相互切磋,比如东莞张穆、番禺屈大

均和王邦畿。还有朱彝尊、姜宸英、汪琬、归庄、计东、汪楫、恽恶、恽日初、顾祖禹、娄采、李世熊、邹祗谟等好友,虽多却不泛交。

九子与朋友切磋学问,以期改变当时的学风,去除虚伪之气。梁启超曾经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说:“中国的学者,向来十有九都和政治有关系……清初因为满洲人初进来,统治者非我族类,第一流学者对他们或采积极的反抗态度,或采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些学者,都对当时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学风做将来预备,所以有许多新颖思想自由发挥,而且因积久研究的结果,有许多新发明。”<sup>[31]</sup>九子不止于独善其身,还有兼济天下之志,其志溢于言表。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唯深羨魏丘子值明清嬗变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sup>[32]</sup>

## [参 考 文 献]

- [1] 钱穆. 国史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357.
- [2] 赵园. 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16.
- [3] 魏禧. 魏叔子文集[M]. 清道光二十五年宁都刻本.
- [4] 谢帆云. 易堂九子·生平和诗文[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87.
- [5] 魏礼. 魏季子文集[M]. 清道光二十五年宁都刻本.
- [6] 林时益辑. 宁都三魏全集[M]. 清道光二十五年宁都刻本.
- [7] 魏禧. 魏叔子文集外编[M]. 清道光二十五年宁都刻本.
- [8] 周奎书.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传记卷[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17.
- [9] 吴海, 曾子鲁. 江西文学史[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 [10]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84.
- [11] 胡迎建.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J]. 江西社会科学,1996(12):65—66.
- [12] 彭玉雯. 易堂九子文钞[M]. 清道光十七年刻民国十四年印本.
- [13]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95.
- [14] 彭士望. 树庐文钞[M]. 豫章丛书本. 民国胡思敬校刊本.
- [15] 李婵娟. 魏禧江西交游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75—78.
- [16] 张修龄. 清初散文论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47.

- [17] 胡守仁,姚品文.魏叔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8]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9] 戴存仁,邱国坤.易堂九子散文选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 [20]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74.
- [21] 李婵娟.魏禧在江浙交游活动考述[J].黑龙江史志,2008(16):73—74.
- [22] 毛先舒.东苑文钞[M].清康熙年刻思古堂十四种书本.
- [23] 王运熙.清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96.
- [24] 邱国坤.易堂九子年谱[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128.
- [25]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254.
- [26]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J].学术月刊,2003(09):88—94.
- [27] 魏祥.魏伯子文集[M].道光二十五年宁都刻本.
- [28] 施闰章.施愚山集[M].安徽:黄山书社,1992.
- [29] 陈永正.岭南文学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43.
- [30] 马将伟.易堂九子与岭南遗民交游考述[J].岭南文史,2008(4):17—21.
- [31]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文学遗产,2006(1):13—15.
- [32] 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J].文学评论,1990(2):50—58.

(责任编辑:程晓芝)

## On Yitang Jiuzi's Ancient Prose Creation in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WU Chang-lin, TANG Ji-c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uld no longer be described statically once it is placed in a large space of regional culture, for when regional space changes, regional culture changes accordingly. The so-called Yitang Jiuzi, the 9 essayists, had a wide range of friend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ir writing shows the interaction with different regional literatures. Jiuzi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regional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hey deepen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on literary cre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Jiang You, Wu Yue and Wan Yue who have made friends with Jiuzi, and discuss the exchange of the ideas and writing between Jiuzi and them, thus illustrating the changes in Jiuzi's creative styles.

**Key words:** Yi Tang Jiuzi; Ancient prose creation; Regional culture; Space conversion